

上 编

第一章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19 年 5 月至 1923 年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线索为：（1）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列强的矛盾反映到中国政局中来，体现为军阀的纷争、混战进一步加剧。（2）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一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日本帝国主义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加紧侵华，北洋军阀的卖国残民统治，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影响，为爱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阶级和思想基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促成了五四爱国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揭开了序幕。五四运动后期，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看

到了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作用，开始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第二阶段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23 年底。中国由日本独占回到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各派军阀的纷争、混战加剧，爆发了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北京政权落到直系军阀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也开始领导农民和青年、妇女运动；开始了对国民党的联合战线工作；着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在绝望中遇到了中国共产党，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多种改良主义主张。

一、五四运动——伟大的开端

（一）‘五四’前夕的中国与世界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国内处于军阀割据、南北对峙的局面。1916 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另一个大的军阀派系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此外，还有割据一省或几省的非北洋系地方军阀，如晋系阎锡山、桂系陆荣廷、滇系唐继尧、湘系谭延闿等。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假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

由于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当时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和段祺瑞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14 年 8 月下旬，日本对德国宣战，随即于 9 月出兵我国山东，10 月占胶济铁路，11 月占领青岛，全部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 年 5 月，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二

十一条”。1917年至1918年，日本又通过向段祺瑞提供总额约5亿日元的“西原借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铁路、税收、矿产、森林资源以及军队训练权。1918年5月，日本又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调派七八万军队侵占中国东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经济势力迅速扩张。从1913年到1919年，日本在华企业由36家猛增至178家，在中国东北开设的银行由21家增至38家。1918年9月，在中日双方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驻日公使章宗祥对日本夺取原德国在我国山东侵占的权益竟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与北洋军阀政府的一再卖国，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更趋严重。

段祺瑞对内打着共和招牌，实行军阀独裁统治。他在驱逐张勋、重掌北京政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重新组织了由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操纵的御用国会。孙中山为此于1917年7月发起护法运动，8月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9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出兵讨段，形成了南北分立对峙的局面。段祺瑞派兵讨伐护法军政府，并调直系军队打前锋。直系军阀另有图谋，与西南军阀勾结，排斥段祺瑞，主张停战息兵，和平解决。11月，段祺瑞被迫辞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与此同时，南方护法军政府内部也发生分裂，孙中山遭滇、桂军阀排挤，于1918年5月被迫辞职，护法运动失败。在此之前，3月，皖系勾结奉系入关声援，冯国璋被迫再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直系与西南军阀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进一步取得英美的支持，与皖系对抗，军阀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各派军阀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角逐、争斗、混战，把中国推到更加黑暗的深渊。

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国家的情况更加败坏，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矛盾日益深化。而护法运动的失败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

民主主义革命已陷入绝境。全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自身解放，迫切要求新的革命。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首先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的政治力量的成长。由于欧洲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面粉业和其他少量轻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重工业的有些部门如采矿业、运输业等也有了相当的发展。1912年至1919年7年间，新增资本达1.3亿元，相当于辛亥革命前40年投资的总和。战前我国近代工业计698个，到1920年增至1759个。民族资本的纺纱厂由战前的16家增至1922年的54家，面粉厂1913至1920年新增47个。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新的政治力量随之成长。在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扩大较快。据统计，1918年全国商会会员有16.2万人，华侨商会会员有2.1万人。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日益活跃。他们对内不满封建军阀对民主制度的践踏，反对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要求关税自主，收回利权。但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又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妥协性，他们已不能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这一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新式知识分子的人数也大为增加了。据估计，五四运动前夕，全国受过新式小学教育的有近千万人，受过中等教育的有十多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数万人，还有一些留学人员。新式知识分子思想敏锐，眼界开阔，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迫切要求社会变革，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还常常在革命中发挥先锋和桥梁作用。

在新的政治力量的增长中，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已达200万人以上。中国

工人阶级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优点：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最重，因而在革命中最坚决、最彻底；人数虽少，但高度集中，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易于结成工农联盟。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经常用罢工这一手段来反抗各种压迫。1912年至1919年5月，罢工达130多次。这些罢工多为自发性的经济斗争，但开始由分散的经济斗争向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转变，如1916年天津工人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而举行的罢工就说明了这点。

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很快成了一块空招牌，虚假的民主共和形式加上真实的专制独裁内容，使人们在备受欺凌的同时又备受愚弄。这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痛苦思考。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①因此，他们便向传统的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2卷1号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或撰稿。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

^①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载《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6页。

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科学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他们高举这两面光辉的旗帜，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政治；大力宣传科学思想，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盲从。为了提高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提供新的载体。

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仍然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局限于知识界等严重缺点。但它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猛烈的冲击，使中国知识分子、广大青年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它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传播了科学思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更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正当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西方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唤醒，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此走向高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使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新希望。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

山由衷地欢迎十月革命。1918 年夏天，孙中山在上海致电苏俄和列宁，表示“极大的敬意”，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对中国最大最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自此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从而在中国形成了赞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在 1918 年 7 月到 1919 年 1 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了先进分子对中国出路的新思考。

十月革命还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逐步认识到了发动群众直接斗争的必要性。1918 年，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开始时只是号召青年从伦理道德方面去修身，反对青年参与政治。但在 1919 年 1 月发表的《除三害》一文中，他转而号召“一般国民要有参与政治的觉悟”，起来同军阀、官僚、政客进行斗争，认为“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3 月，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的《我的国内和平的意见》中提出，要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发动工农群众。李大钊从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战胜”、“庶民的胜利”中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提出“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①。可见，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高潮中不断爆发的游行示威、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等群众斗争方式，深深地感染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人们认识到必须“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当时另一件世界大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 年 1 月，27 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订对德、奥等战败国的和

^①《青年与农村》，载《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48 页。

约。实际操纵这次会议的是美、英、法、意、日五国，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统克里孟梭是三个决策人物。中国派出由陆征祥（军阀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先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和会的操纵者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由拒绝讨论。代表团又提出山东问题，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胶州湾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利归还中国。4月30日，美、英、法三国在邀请日本参加、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议定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打消了中国人民对美、英帝国主义的幻想，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由此爆发。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

全国各阶层人民一直在关注着巴黎和会，纷纷通电呼吁争回国家主权。4月30日、5月1日，陆征祥密电北洋政府，报告中国人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已经失败。同日，上海《大陆报》首先披露了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2日，身为徐世昌总统顾问的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称从梁启超的巴黎来电中“证实”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同日，蔡元培把巴黎的消息通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外交的失败促使人们迅速地行动起来。

5月3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集会，决议致电巴黎中国专使，要求拒签和约，并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集会在天安门前。他们高呼“取消二十

一条“还我青岛”“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此三人是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集会演讲后，即列队游行。他们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并一路散发传单。其传单《北京学生界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当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西口时，受到外国巡捕和军阀政府军警阻拦，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在匡吾生带领下，学生们冲入曹宅，痛打了正在那里的章宗祥。因找不到躲在箱子里的曹汝霖，愤怒的学生便放起火来。曹宅起火后，大批军警赶来镇压，捕去了尚未离去的 32 名学生，这就是有名的“火烧赵家楼”。

5 月 5 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营救被捕学生。6 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领导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运动。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北京大学的进步教授成立了教职员联合会，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北京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于 7 日释放了被捕学生。北京各校学生于同日复课。

军阀政府在各校学生复课后，仍对爱国学生进行迫害。5 月 8 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审判，随后北京检察厅传学生预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成了反动派攻击的主要目标，北京政府已内定撤销其职务。9 日，他被迫辞职出走。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不仅以“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深得知识分子的赏识，更因其坚持爱国立场，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受到青年学生的拥戴，他的辞职在学生中激起波澜。14 日，北京政府下令慰留被迫提出辞呈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并责成北京和各省加紧镇压学生运动。学生们一面强烈抗议军阀政府对学生的镇压，一面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在这种情况下，从 5 月 19 日起，

北京学生再次实行总罢课，罢课人数达到 2.5 万人。学生们组织了“救国十人团”，上街演讲，开展反帝宣传，广泛展开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活动，并组织了护鲁义勇队。

学生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威胁着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日、美、英、法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军阀政府施加压力。6 月 1 日，军阀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公然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辩护；另一道命令再次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纵火伤人”、“举动越轨”，已构成“非法行为”，并宣布查禁学生联合会、义勇队，责令学生即日复课。北京政府的媚外残内行径，更加激怒了爱国学生。6 月 3 日，北京各校 2000 余名学生上街演讲，遭到军警镇压，178 人被捕。4 日，上街演讲的人数更多，被军警捕去近 800 人。5 日，5000 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势如怒涛，军警捕不胜捕。

由北京学生点燃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济南、长沙、广州、武汉、南京、成都等地的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纷纷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响应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支持和响应了国内的爱国运动。

从 5 月 4 日至 6 月 3 日，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运动的中心在北京，主力是青年学生。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唤醒了民众，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显示了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

（三）“六三”以后爱国运动的发展

北洋军阀政府对爱国学生的大逮捕，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怒。工人阶级首先行动起来，举行大罢工，开始以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6 月 5 日，上海日资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到 11 日，参加罢工的企业有 50 多个，人

数达到六七万人。工人大罢工，使上海水陆交通完全断绝，陷于瘫痪状态，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以沉重打击。在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推动下和爱国学生的动员下，上海商人举行罢市。6月5日，全市各商店、饭店、戏院、银行等停止营业。许多罢市店铺门首贴着“国家将亡，无心营业”、“罢市救国”、“挽救学生”、“不惩办卖国贼不开门”等标语。两万余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此前已经罢课。这样，就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在“三罢”的当天，商、学、工、报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以加强对“三罢”斗争的领导。这样，五四运动就超出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这标志着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上海开始的“三罢”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全国革命运动高潮，严重威胁着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6月7日，北京总商会向北京政府呈文，要求罢斥曹汝霖等，“以安人心而全大局”。天津总商会6月10日给北京政府的急电更使反动派惊恐。电报说：“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①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下令免去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五四运动取得了第一个胜利。

随着巴黎和约签字日期的临近，全国人民要求拒签和约成为五四运动的又一个主要目标。6月17日，军阀政府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竟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

^① 1919年6月11日天津《大公报》。

出后，全国人民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极为愤慨，各地掀起了拒签和约运动的高潮。由于和约直接涉及山东问题，因此山东的拒签和约运动开展得较为普遍而激烈。6月20日，由山东各界推选出的80名代表冒雨到新华门前，向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提出了“拒签和约、废除密约和惩办卖国贼”三项要求。27至28日，山东、天津、北京、陕西等地及归国留学生代表联合到总统府请愿。全国各地各界人士要求拒绝和约签字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他们“如违民意，当与曹、章、陆同论”。代表团曾收到团体或个人拍发的7000通拒签和约的电报。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一大早，旅居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便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不准他们赴会签字。由于全国人民的斗争，终于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是五四运动取得的另一个胜利成果。至此，历时50余天的爱国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罢免卖国贼和拒签和约两个目标达到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发展。7月25日，军阀政府以济南广大群众捣毁反对爱国运动的《昌言报》事件为借口，宣布济南戒严，任命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是亲日派官员，他公然主张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反对抵制日货运动，因此遭到了山东人民的强烈反对。8月3日，马良派兵镇压要求解除戒严令的请愿群众，逮捕了16名学生。5日，他又杀害了三名回族爱国分子。“马良祸鲁”的暴行，激起了山东和全国人民的公愤，由此掀起了一个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的请愿运动。

11月间，福州又因学生抵制日货，遭到日本浪人的袭击，致使学生六人受重伤，造成“福州惨案”。对此，福州全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各界群众纷纷集会声讨，焚烧日货，掀起了抵制日货、支持福建人民斗争的爱国浪潮。

12月2日，为声援福州人民的反日斗争，湖南学联发动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在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大会，但遭到军阀张敬尧的镇压。在此之前，毛泽东领导开展的反对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这时进一步高涨。12月6日，长沙各校学生总罢课，明确宣布“张敬尧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在各界民众的支持下，“驱张”斗争终于取得完全胜利。

1920年1月，从天津开始的反对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斗争迅速推向全国，北京政府因此一直不敢补签和约。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这种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中国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因此，在斗争中，许多人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口号，走上了彻底反帝的道路。第二，全国人民同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实现了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和拒签和约。第三，运动中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战斗口号，这是反帝反封建口号的具体化，反映了中国人民当时对革命主要对象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纲领。第四，运动中形成了各阶级、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广泛性及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团结性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页。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政治运动，又是新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作为前者，包括 5 月 4 日至 6 月 28 日共 56 天时间。作为后者，则包括从 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创刊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共 5 年零 10 个月的时间。“五四”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是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它为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原来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五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哺育了一代杰出的人才，这不仅包括我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包括后来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已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五四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引起的，又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因此成为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第二，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命运的开始。第三，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和组织的，他们本质上是正在转变中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通过具有共产主义思想

的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初步的联系，它已不再是一个自在阶级，已能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和领导阶级。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在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们通过斗争实践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伟大作用，开始自觉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力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也锻炼和造就出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五四运动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的先进分子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了彻底反帝的道路，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解放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努力去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7月1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政府在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第二年春天，苏俄宣言在中国报刊发表后，在社会各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促进作用。由于以上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主要表现在：

第一，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运动后半段时间内，全国各地新出版的曾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报刊就有200多种。“五四”前出版的《新青年》，这时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阵地。

《每周评论》、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等，也不断刊登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情况的文章。此外，李大钊等在北京创办了《少年中国》，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周恩来等在天津创办了《觉悟》，恽代英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瞿